

刘小枫编

中国文化 的特质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中国文化 的特质

刘小枫 编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论著集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责任编辑：周健强

封面设计：董学军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中国文化的特质

ZHONGGUO WENHUA DE TEZHI

刘小枫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61,000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定价5.40元

ISBN7-108-00210-8/C·3

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编委会：

主 编 汤一介

常务副主编 封祖盛

副 主 编 景海峰

编 委 庞 朴 李泽厚 金春峰

郁龙余 刘小枫 林英男

总 序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促进海内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加深彼此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相互了解，介绍三十多年来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情况，我们编选这套《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

近几年来，我们祖国大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而且这种研究中国文化以及探讨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热潮可能还会继续发展。在开始一个阶段，一般地从宏观方面展开讨论，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人们了解到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停止于此，要深入下去。如何把中国文化和它发展的前景问题深入地研究下去，可以从多方面努力，例如，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研究、某一专门文化问题的研究、断代文化史的研究、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国内外文化现状的调查和研究等等，这中间也许具体地专门文化问题的研究应受到重视。我们编选这套《港台海外中国文化研究论丛》，就是想按专题把当前港台海外这方面的研究介绍给读者。当然所编选的十个或更多的选题，还是比较广泛的，所选的内容是否完全合适也有待进一步审查。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对港台地区和其它国家研究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多，首先较系统地介绍

给读者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想编辑选择一些更为专门问题的资料，提供给读者参考。

“中国文化”是指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它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指现实的中国文化？是指所谓“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我想，也许“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很笼统和含糊的概念，它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研究。不过，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好，“现实的中国文化”也好，或是“大传统”、“小传统”等等，研究这些问题，即和“传统与现代化”这个问题相联系。而“传统与现代化”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外古今”问题。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应该从中国历史上曾经较好地解决过，这就是从公元一世纪到十世纪对印度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一方面它保存了印度佛教，另一方面又改造了印度佛教。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专门的文章讨论过，这里不需要再多写了。但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充分地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会大大促进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西方文化十七世纪初传入我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起初由于政治的原因人为地中断了西方文化的传入，在鸦片战争以后又是被动地（被迫地）接受西方文化，因而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总是处在落后的状态。有的学者担心吸收外来文化会使自己的文化中断，所以反对所谓“全盘西化”。我想，不必有此担心，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全盘”的，但是较充分地吸收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西方文化，却是完全必要的。

我想，只要是真正关心中国文化发展前途的人，都会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没有经过认真的批判和改造之前，它对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是大于正面作用的。但是要人为地斩断我

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不可可能的，而且是不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没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就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日本能充分吸收西方文化，还是因为他们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相反，印度由于不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很难真正实现现代化。

庞朴同志在一次会上提出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文化传统”是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而“传统文化”应是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对后者，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上的现象来研究，可以肯定它或者否定它，而对前者，则是如何使之适应时代来选择的问题，因此它将总是一有特殊性的（或民族性）而又有当代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不管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一个能延续下去的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其文化传统中，而且不管如何改变它仍然是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就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在“欧洲中心论”破除之后，文化是在一“全球意识”下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在这种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激荡中，世界的总体文化才能是丰富多彩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曾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共同的精神财产，民族的片面性的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这里的“文学”是用“Literatur”一词，译者注说：“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文化的研究似乎应是由国别的（或个别民族的、地域的）研究，而进入到比较文化的研究，然后才可能有一对世界文化的总体研究和了解。所以照我看，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如果没

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反映这个时代的要求，从而必然要游离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之外，这样的文化是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的。但是，如果没有“民族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来，没有特色的文化只能是一种“东施效颦”的文化，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不会有贡献的。我们今日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有长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它的文化发展将一定要这两种意识结合起来，而更应注意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以便创造出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化。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既保持其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吸收各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外来文化，并且超越其传统文化。所以固守“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和“本位文化论”都是不利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的。

当前研究我国的文化发展，我想切忌急功好利，要潜下心来系统地作一些理论上的分析。我们的国家需要一批真正能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思想家，他们应该是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总结出有科学价值的现象，从而为我们的文化传统的流向指出一个发展方向。我想这样一批思想家应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既然我们的中国大陆已经结束了“闭关自守”，而实行了“开放”政策，看来大门是再也关不住了。因而是取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还是取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是大不一样的，能取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会主动得多，会更有利于我们实现现代化。

我们编选一套海外港台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外国和港台地区的学术发展有些帮助。虽然我们编选了这套书，但并不是说书中的观点我们都同意，而只是介绍他们的观点，让我们了解而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们的国家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国家，但是我们正在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古老而又常新，
将是所有的中国人所向往的。

汤 一 介

一九八八年一月

编 序

1. 如果从形态的角度来看,所谓“文化”有两个层次,其一是精神文化,亦即哲学、宗教、艺术所体现的某种精神意识;其二是社会文化,亦即某一民族的历史中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结构、社会组织、实用技术、民俗习惯、礼制宗法等。这两个层次当然是有其关联的,但我们在考察某种文化时,就不得不分而视之,注意两者的差异。例如,在考察中国文化时,所谓道家和道教就不能混为一谈,同样,中国的佛教哲学与普通百姓所信奉的佛教信仰,又有相当的不同。

2.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对所谓的精神文化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具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的考察。精神的层次与生命——社会——历史的层次,向来有距离。如果不对后一个层次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涉及文化的价值建构的许多问题恐难弄清。

3. 本文选收集了港台海外学者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国文化的特质方面的论文,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的精神层次(儒、道、释)和社会层次两个方面。

4. 港台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尤为热心,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致:作为炎黄子孙,身在海外,远离大陆,有责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港台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同大陆的同类研究比较起来有两大优势:其一,他们的起步明显要早得多;其二,他们的学术

研究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能更多地从学术的立场来分析和立论。无疑，他们的学术成果是有参考价值的。

5. 港台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都受过西方学术的训练。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不难见出他们采用了诸多西方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和范畴，有的还积极地将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新学派的立场和观点运用到中国文化研究上来。

6. 中国文化自有其特点。缺乏科学的形态又正是其特点之一，这不仅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然科学的完整形态，也是指缺乏人文科学的自足形态。但这并非等于中国文化没有审视自身的方式。西方的人文科学乃是其文化审视自身的方式，用此方式来审视中国文化，当然有益，不过，中国文化审视自身的方式本身也应被审视。这一课题似未触及。

7. 另一方面，港台海外学者在借用西方人文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来考察中国文化，虽然起步较早，却并非细致深入，停留于外观和表层的情况仍很普遍，精神文化方面尤其如此。在这一方面，“形而上学式”的描述较多，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尚少。在社会文化方面，情形也并非令人满意。西方人文科学少谈其文化的特质，但从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技术学诸具体学科的构架出发，去具体分析、解剖文化现象和本文，则有大量丰硕成果。港台海外学者离此工程还有相当的距离。此外，某些学者对西方人文科学（尤其是现代的新兴学派）的把握，还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8. 对文化的研究，除了形态的区分问题，还有一个层次的区分问题。文化社会学家曼海姆在其《论世界观的说明理论》(Beiträge zur Theorie der Weltanschauungs-Interpretation)一文中，曾详细区分了三个层次。无论如何，在考察文化形态时，我们起码得分清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文化形态的事实性层次，亦即某一文化因素在历史—社会中的实际状态；其二，文化形态的价

值意义层次，既然是价值意义层次，它便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超逾了它本身就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换言之，在这一层次中出现了价值评判。区分这两个层次，目的在于不致使文化研究中出现两类层次的问题相互掩盖的情形。例如：有的学者性近儒家心学一路，自然把上承孟子的心宗视为真正的儒家，并予以极高的价值评判，进而从儒学只应有此得孔、孟真心的一家，推论到历史上影响思想意识的儒家只此一家。此种推论往往是以极为不引人察觉的方式来完成的。这种排斥和评判隐含着掩盖。另一方面的例证是：以事实来取代价值，通过考察和证实某一文化形态的历史实际存在，来证明其价值意义。

9.港台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大都带有明确的价值评判，这表明，学者之心首要关怀的是中国文化的活的生命。不消说，这种态度值得钦佩和赞同。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应当注意到混淆前述两个层次的问题。由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应从现代诸人文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出发，具体细致地考察文化的事实性层次，另一方面，亦当从价值层次入手，作深入的分析。西方现代人文科学在这两个层次方面对其文化形态本身所做的探究，明显走在了前面。因而，我们是可资借鉴的。类似于韦伯、西美尔、舍勒、海德格尔、福柯、弗雷泽、舍斯托夫、列维·施特劳斯、荣格那样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在我看来，港台海外部分学者正朝此方向努力，虽然人数不多，尚未有重大成果，但毕竟已经起步。在这一方面，我想首推的是余英时教授的工作。

10.港台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评判与大陆一样，分为三大倾向。或者弘扬之，为此，西方文化要么成了供贬黜的参照物，要么成了供佐证的材料（诸如现象学的加括不过是庄子之“无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成了禅宗的不立文字）；或者贬抑之，为此，中国

文化的陋弊一一陈列；或者兼容并包，中西相互弘阐，为此，要么探寻共同构架，要么汇通范畴。如今，想取得一致似难以强求，不妨百家争鸣，对立越鲜明越好。

就上述三种倾向而言，第一种倾向远较强烈，第二种倾向次之，第三种倾向虽然猛烈，却力量不足。有趣的是，港台的社会生活形态已相当西化，精神之域则是另一码事。可见思想学术形态毕竟是思想学术形态。

本文选对这三种倾向都兼而顾之。

11.港台海外正迎接第三期儒学之到来，当代儒家对中国文化的特质多有论列和理论。本集没有收入新儒家的有关论述，主要因为本丛书已有当代儒家专辑，再则篇幅亦有所限。本集主要反映当代港台海外学术界较为活跃的学者的有关学术成果。

刘 小 枫

1987年11月于深圳后海湾

目 录

总 序.....	汤一介 (1)
编 序.....	刘小枫 (6)
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	方东美 (1)
中国哲学的特性	成中英 (32)
谈儒道两家的“道”	王邦雄 (59)
——从儒道两家的“心”，谈生命价值的开发	
中国哲学之理论与实际	陈荣捷 (86)
——特论人本主义	
中国社会思想与行为上的个人地位	梅贻宝 (103)
中国语文的特性	吴 森 (118)
中国语言的特性及其对中国文学之影响.....	方师铎 (130)
中国语文中隐藏着的伦理思想	方师铎 (175)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	殷海光 (182)
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孙隆基 (204)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王寿南 (232)
中国传统士道与从政观念.....	江举谦 (251)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余英时 (264)
——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中国法律与政治哲学	吴经熊 (307)
中国传统民俗的特质	杨允元 (328)

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

方东美

在本文中我所要谈到的中国形上学，其含意迥异乎一般所谓“超自然形上学”(Praerernatural Metaphysics)。根据后者的说法，人，以及其所居处的宇宙，均各自为两种极不相容之力势所支配而剖成两橛；其致极也，遂于天堂地狱之间也创下了一道鸿沟；人，就其为一体存在而言，虽由灵肉两者所组成，而两者之间竟又彼此冲突不已。

我以“超越形上学”(Transcendental Metaphysics)一辞，来形容典型的中国本体论，其立论特色有二：一方面深植根基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入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它摒斥了单纯二分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从此派形上学之眼光看来，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浹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其中以种种互相密切关联之基本事素为基础，再据以缔造种种复杂缤纷之上层结构，由卑至高，直到盖顶石之落定为止。据一切现实经验界之事实为起点，吾人得以拾级而攀，层层上跻，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同时，再据观照所得的理趣，踞高临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使吾人遂得凭借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释宇宙存在之神奇奥秘，与人类生活之伟大成就，而曲尽其妙。

我们之心态取向既然如此，很自然地，中国各派的哲学家均能本此精神，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建立一套“体用一如”、“变常不二”、“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之形上学体系，借以了悟一切事理均相待而有，交融互摄，终乃成为旁通统贯的整体。

职是之故，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念，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借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机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模式而论，约有两种特色。自其消极方面而言之，(1) 否认可将人物对峙，视为绝对孤立系统；(2) 否认可将宇宙大千世界化为意蕴贫乏之机械秩序，视为纯由诸种基本元素所辐辏拼列而成者；(3) 否认可将变动不居之宇宙本身压缩成为一套紧密之封闭系统，视为毫无再可发展之余地、亦无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可能。自其积极方面而言之，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宇宙万象，隳然纷呈，然尅就吾人体验所得，发现处处皆有机体统一之迹象可寻，诸如本体之统一，存在之统一，乃至价值之统一……等等。进而言之，此类披纷杂陈之统一体系，抑又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如光之相网，如水之浸润，相与洽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之广大和谐系统。

中国形上学思想之主流，就其全辐发展而论，大致上可譬作乐谱上之若干音节线，其间隔长短，容或错落参差不齐，然各种不同型态之思想潮流，均可借诸音节线而使之一一凸显；依三节拍，迭奏共鸣，而以各节拍之强弱，示其份量之轻重。自远古至纪元前十二世纪，中国形上学之基调表现为神话、宗教、诗歌之三重奏大合唱。自兹而降，以迄纪元前 246 年，其间九百余年，是为中国哲学上创造力最旺盛时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一时争鸣，竞为显学。紧接着是一段漫长的酝酿、吸收与再创期（纪元前 246 —

纪元 960 年)；势之所趋，终乃形成具有高度创发性之玄想系统于中国大乘佛学。自纪元 960 年以迄今日，吾人先后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的形式中复苏了中国固有的形上学方面的原创力，而且新儒学多少染上了一层道家及佛家色彩。在此一段再生期之中，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是产生了三大派形上学思潮：a 唯实主义型态之新儒学；b 唯心主义型态之新儒学；c 自然主义型态之新儒学。

鉴于时间限制，有关中国形上学史上各派运动发展之详情，今天不遑细论。本文重点只集中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与大乘佛学三方面。三者相提并论，是基于其系统虽然歧异，然却同具三大显著特色：a 一本万殊论；b 道论；c 个人品德崇高论。

首先，我要提出：何种类型之人物才配挺身而出，揭发中国智慧，而为其代言人？诚如英国剑桥大学康佛教授（Prof. F. M. Cornford）所言，那必须是要集“先知、诗人、与圣贤”于一身的人物，始足语此^①。我不必列举种种历史上的事实理由，说明中国哲学家何以非如此不可。但看庄子对古代哲学家——“博大真人”——之欣赏赞叹不置，便足透露个中消息了^②。可惜古人这种自能独得天地大全之通观慧见，后来却由于为了应付社会变迁、种种现实需要，而渐次丧失了，沦为“小知矻矻”式的分析知见。无怪乎在中国一切伟大的哲学系统之建立者都得要以一身而兼“诗人、圣贤、先知”的三重身份，才能宣泄他们的哲学睿见。诚然，由于个人的性分差异，难免在三者的组合上，间或有特别偏重于某一面之倾向。

道家之诗人灵感或气质，可说是得天独厚，使他们得以凭借诗人之眼放旷流眄，但见人人之私心自用，熙熙扰攘，奔竞于浊世，均须一一加以超化，使之臻于理想的实存境界，方能符合高度的价值准衡^③。在佛家之心目中，这便与解脱超度，渐向“涅槃”之说十分相近，而涅槃说同时又为对应“真如”（“如来”或“法身”）之绝妙描